

张光直作品系列

Kwang-chih
Chang



考古人类学随笔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书中所收文章多写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为他人新书撰写的序文、讲演辞、《中国文物报》专栏文章及访谈记录中，作者深入浅出地介绍考古人类学的新知识、新发展，选评了国内外考古书籍，也记述了学界的师友人物，表达了对考古时事的看法以及对海峡两岸学术文化前景的瞻望。

读者不仅可以了解作者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更可以切实感受他的诙谐、宽容、乐观、热情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正像朋友所说，“他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热已永远留在人间”。

ISBN 978-7-108-0417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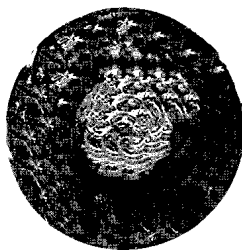
9 787108 041753 >

定价：50.00元

张光直作品系列

考古人类学随笔

张光直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考古人类学随笔 / 张光直著. —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

(张光直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4175-3

I. ①考… II. ①张… III. ①考古学—人类学—文集

IV. ① K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1805 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8

字 数 183千字

印 数 0,001—4,000册

定 价 50.00元

前 言

这本小书所收的 48 篇文章，绝大部分已经发表过。其中很多篇原来发表在中国的报纸和杂志上，是以社会上一般人为对象的。有几篇学术味道比较浓厚些，但也是朝着深入浅出那个大目标努力撰写的，相信读这本书的人，不会遇到生涩难解的语言问题。

46 篇分入五组，第一组我叫它作“狗尾‘序’貂”，是因为为了它作序的书，都是非常值得读的书，我写的序夹在书里，沾着原书的光，也许有人看一看。第二组文字我给它取了“大题小作”这个名衔，表示我不是不知道大题不宜小作，但我希望读者们能透过纸背看到这些简短结论有庞大的基础。第三和第五组文章的标题不言自明。第四组是我为北京《中国文物报》自 1993 年夏季开始写的一个专栏。因为《中国文物报》寄来给我常常脱期，我不知道是否寄去的稿件全都发表。在题目后的星花下面如果没有注明年月日，那篇文章便是根据原稿排版的。如已发表，便依印出来的语句。另收入陈星灿先生、海基·菲里先生与我的访谈记录，作为附录部分。

目 录

前 言	1
一 狗尾“序”貂	
《时间与传统》序言	3
《安阳》张序	8
《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 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序	10
《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 论文集》序	15
《中国著名古墓发掘记》序	18
《先秦考古学》张序	21
《李亦园文化论著选集》序	23
《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序	26
《台湾考古学书目》序	29
《台湾历史上的土地问题》张序	31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序	33
《台湾平埔族文献资料选集——竹堑社》张序	38

二 大题小作

在学术上迎接 21 世纪	43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中国的现代化	47
从中国古史谈社会科学现代化	53
中国古代史的世界舞台	59
人类学的社会使命	
——评介陈其南《文化的轨迹》	66
再谈人类学的社会使命	
——简介“文化长存学社”	69
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国际研讨会开会致辞	76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	79

三 关于台湾

台湾考古何处去?	85
《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发刊辞	92
台湾史必须包括原住民的历史	94
台湾应有像样的地方性历史博物馆	98
关于台湾省历史博物馆的几点建议	102
政府对走私文物市场有无政策?	104
抢救圆山遗址	106
台湾考古学者该与福建和东南亚交流了	109

四 一个考古工作者的随笔

——《中国文物报》专栏

谈“图腾”	117
介绍林寿晋《先秦考古学》	119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创立 44 年	121
建议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读民族学	124
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	126
谈文物盗掘与走私	128
北大考古系赛克勒博物馆开幕有感	130
怀忆民族学前辈学者凌纯声教授	132
考古工作者对发掘物的责任与权利	134
撰写研究计划申请经费经验谈	136
追记台湾“浊大计划”	138
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	141

五 杂文

新年三梦	151
谈龙骨与龙	153
怀念高去寻先生	157
台湾新考古学的播种者	
——忆李光周先生	162
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	166
哭童恩正先生	174

附 录

中国考古向何处去	
——张光直先生访谈录	陈星灿 181
与张光直交谈	海基·菲里 205

一 狗尾“序”貂

《时间与传统》* 序言

布鲁斯·坎格尔教授的《时间与传统》是一本讲考古学理论的好书，在美加考古学界也是受人尊敬和重视的一本书。它的中译本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应当是有积极影响的。

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最近两年来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对当代中国考古研究活动固然是很可靠的反映，而在这里面根本没有“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我相信中国考古学界对理论的漠视不是偶然的，而有它历史上的一些因素。首先，中国传统史学本来就缺乏对历史理论的有系统的讨论。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历史只包含赤裸裸的、明确的事实，而对它们不加以任何意见或推论。”固然这种观察是很不可靠的，但传统史学确有特别着重对客观史实的记述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则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所以自孔子以来便有“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现象。这种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的作风，自有它趋于极端的一面，所以近代西方史学输入中国以后，便首先以传统史学的这一特征为打击的对象。中央研究

* 布鲁斯·坎格尔著，蒋祖棣、刘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人傅斯年先生在 1928 年出版的《集刊》发刊词中就疾呼要打倒“把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或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为一气的人”！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的史学观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可以说，以反抗传统史学之末流的仁义道德史学为特征的这种史料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占据领导或至少是优势地位。在这种历史观培育下发展起来的考古学，也就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因而把理论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严谨的治学方式。这种以史料及史料考证、排比为主的历史观在近三四十年曾受过剧烈的批评和批判，而且近年来中国历史界对历史理论进行讨论的兴趣也有很大提高。不过，在考古学上惟一有系统的指导理论，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关于这种理论在考古学的作业上如何具体运用，一直很少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田野实践。所以，马恩的唯物史观虽然对中国历史在宏观上起了巨大的、高级的指导作用，不过据我的观察，它还没有广泛地在中国考古学的作业中发挥很大的具体作用。

其实，要讨论考古学理论在中国考古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我们首先得说清楚在我们使用“考古学理论”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概念是什么。最近在《考古学专题六讲》这本书里，我把自己对几个常用的有关名词的用法说明了一下：“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取得资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的总结，并反过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工作。上面这个对理论的定义，我想一般是可以使用的。但这个定义比较狭窄严谨，因而在一般的运用中，我们不妨把它放宽些。我们可

以说，考古学上的理论是在考古作业的每个步骤上指导我们作何选择，如何做此选择的、关于文化现实、社会现实的有系统的一套看法和想法。换句话说，在考古实践中，我们应当先知其所以然才能决定其然。使我们能知其然的便是考古理论。口口声声说他不相信考古理论，或者说他没有考古理论的人，并不是真没有考古理论，而是只有未经检讨的、不成系统的，或者甚至是迷惑混乱的理论。进行考古实践并不是遵循一条不变的道路盲目自动地向前走，而是每一个步骤都会碰到岔路，需要加以选择。有理论的人进行这种选择是有根据的、有信心的；没有理论的人，进行这种选择是盲目的。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考古实践离不开考古理论。我们到田野去调查遗址的时候，应该如何调查？考古调查不是只有一个不变的方式，而是根据我们调查的目的和对古代文化社会生活的不同了解而有所区别。有人看到不同的遗物群便把它们当作不同的文化；另一些人则把它们看作同一或不同文化对不同生活需要所做的不同适应性行为的表现。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便对我们调查的范围、深度、顺序以及发掘与否等诸决定，有很大关系。考古发掘更是一套复杂的程序，从打桩子到回填之间一步步的工作应如何进行，有着许多不同的方式。怎样能忠实地记录资料，同时又能提供回答特定问题的资料，这就要看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具体地点、范围、各种专业人员的使用、发掘的细密程度等等问题上进行怎样的选择。发掘出来的遗物如何处理？有哪些可以留下来，哪些可以抛弃？对器物进行分类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这种目的又应当使用哪些分类标准？——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每个考古工作者必须回答的。无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在进行自己的选择时，考古学者是一定要应用他对历史认识的理

论的。这几个例子应该可以说明考古理论与考古实践不可分割的关系。理论并不是一种空洞的主观成见。它需要与客观资料相对照。考古工作者不会没有理论，只是有人有好的理论，有人有不好的理论。如果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考古学的理论不足重视的话，我们不妨问一问，是盲目地使用主观的、未经检讨的理论好，还是先对自己的理论体系做一番检讨好呢？

四五十年来，世界考古学理论的中心很显然在美国。这并不是说美国有最好、最正确的考古学理论，而是说美国考古学界的理论是多元化的，也是特别发达的。因此，考古学工作可在许多丰富的理论体系中做适合自己立场与见解的选择，并且在这些体系中不断得到启示和刺激。事实上，就西方考古学史来说，考古学理论的有意识的发展也不过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现象。在这以前，西方考古学也是以器物为主要对象的，即以器物史的发现和文化史的重建为主要的目标。因而，这种研究的主要方法便是年代学、地层学和类型学。30 年代欧洲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不少人开始主张，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应当从器物转向人。考古学资料是物。如何从物去研究人的生活，这便要有借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在这方面比较有名的一篇文章是英国戈登·柴尔德在英国史前学会 1936 年年刊上发表的一篇《史前史变化中的方法与目标》，其中就大力主张考古学者在理论上要有意识、有系统地讨论如何研究史前时代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这一类的问题。这篇文章在西方考古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不过，考古学理论的蓬勃发展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自 40 年代晚期到 50 年代初期开始，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并且数十年不衰。自 1950 年以来，美国考古学理论的书刊与论文无疑有数千、数万之多。中国考古学界如果对这方

面有加以探索的兴趣，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园地，其中有不少值得参考，值得作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选了布鲁斯·坎格尔这本书翻译并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正因为考古学理论在美国特别发达，以致各种说法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其中良莠不齐，有精华也有渣滓，要在美国关于考古理论的千万种著作中汲取精华，必须首先做一番爬梳清理工作，除滓存精，才不致事倍功半。布鲁斯·坎格尔是加拿大人，在蒙特利尔的马克吉尔大学任教。他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得到的，而且多年来，他在美国考古学理论界一直占有一席非常令人重视的地位。他所以为人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他不仅有精深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不属于哪门哪派，对当代各种新旧说法都能客观地做正面、反面的检讨和批评、整理。读者读他的文章，能中肯地把握理论上的一些基本窍门，对各派学说的要旨优劣都能掌握，最后可以作明智的抉择。现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在即，相信它对中国考古学理论方面的进展一定会起积极、肯定的作用，所以很高兴地写这几段话以志同声之欣悦。

1987年4月于美国哈佛大学

《安阳》* 张序

《安阳》是先师李济先生最后的一本专著；像它的作者一样，这本书在中国考古学的园地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如今它的中译本问世在即，令人感到兴奋。

自从1928年第一次发掘安阳殷墟到今天已经63个寒暑了。我们对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重要性的认识，不但没有被岁月的消逝所冲淡，反而越来越在中国考古学持续发展过程的启示之下而更觉得清楚了。这个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们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半世纪中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至少在目前的知识范围之内，我们可以这样说。学习中国考古学者最好自学习殷墟开始；学习中国近代考古学史者，也最好自学习殷墟开始。

从中国考古学史上说，李济先生的名字是与殷墟分不开的。有“中国考古学之父”的称号的李济先生是中央研究院

* 李济著，贾士蘅译。

自 1929 年到 1937 年发掘殷墟工作的总指挥。在 1949 年以后李先生又在台湾用了 30 年的时间进行战前发掘出来的成果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他一生的学术著作也以殷墟和殷商文化为中心。给学习殷墟的学生带路的人，再没有比李先生更合适的了。这本《安阳》是李先生给殷墟发掘和研究所做的一个总结。教中国考古学的课用这本书作头一本入门书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可是《安阳》原书是用英文写的；在国内教书的人对这本书的中文版的问世，可以说是久已望眼欲穿了。

贾士蘅女士翻译这本书为中文，也是再合适不过了。李先生写这本书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身体欠佳，行动不便，在这本书的材料搜集与写作上，贾女士给了李先生很大的帮助。如今由她自己翻成中文，自是驾轻就熟，对作者的原意也比任何他人都能了解。贾女士嘱我为中译本作序，就写了这几段话以志喜悦。

1991 年 5 月 4 日